



女学人文化随笔

AN UNCOMMON WOMAN'S JOURNAL



谭湘 主编



印痕

YIN 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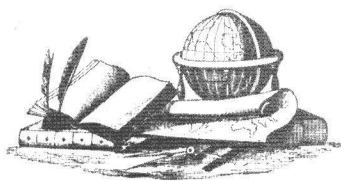


戴锦华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

被写作——此处没有屋顶的房间。无法封闭，拒绝封
四壁墙之间，实现着某种隔离；在共同的天空下，
自己的、或许是共同的命运——作为一个女人，但
不仅是女人。



印 痕

戴锦华 著 河北教育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痕/戴锦华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6

(女学人文化随笔/谭湘主编)

ISBN 7-5434-4463-1

I. 印... II. 戴...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996 号

书 名	印 痕
作 者	戴锦华
责任编辑	孙新龙 李 利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63-1/I·672
定 价	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 乐黛云

时至今日，女性写作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女性已进入各种各样曾经只属于男性的领域，展现着自己多姿多彩的个性，女性在历史和现实的舞台上显现自己的主体性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身份，仍似乎必须予以标识。因为在文化的、社会的舞台上，能与男性并肩的女性佼佼者毕竟是少数。这也是这部女性散文随笔丛书成为必需的理由。

对平等、个性、自由的梦想来说，女性写作，既是对一个不同的性别经验的记录展示，可以补足过去主流写作的不完全的图画，同时又是一种并不刻意追求差异或凸现差异的写作。因此它始终是一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写作方式。如同一位哲人所说，人类的写作，始终是对抗死亡、伸延生命的方式之一。通过写作，我们与同代人交流，也期盼着与未来者对话。通过写作，我们尝试挽留时光岁月，将其留待他日。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写作亦是延展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经验与他人共享的一种方式。

收入这部丛书的作者，大都有着女学者的身份，并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活跃在女性研究的各个领域，为中国女性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她们在这部丛书中汇聚在一起，不失为新世纪伊始的一道文化风景。因为是散文随笔集，所以不同于她们在各自学术论文中的面貌，而展露出她们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和个性。在这套丛书中，她们讨论女性，也讨论社会、人生；她们谈及学术，更述说生活。其中小世界与大舞台，个人与历史，性别经验与社会思考，在各有千秋的写作方式中展现出来。一套微缩画屏，也是大千世界。汇集在这里的这些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们的学术和非学术的写作，既是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同时又是更广泛、更丰富的女性写作的一部分。这种两重性使这套丛书不仅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且饶有情趣。

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世纪、新千年的曙光已经照临。人们已无数次预言 21 世纪将是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以往任何时期的世纪，我想，重要的不同之一应是彻底改观了的新的性别记录和两性现实。人类期待着一个多元、自由的时代，一个更注重个性而不是刻板复制、更尊重个体而不是单一规范、更人性而不是更物化的时代。这套丛书将是一个新的开端罢。

目 录

《1984年》与世纪记忆	3
没有屋顶的房间	9
见证之维	19
狗道	28
书中岁月	38
犹在镜中	48
“圣诞精神”与《西贡小姐》	55
生为女人	69
去而复归	74
悼	81
手记数则	89

见证与见证人	105
滑翔镜中	115
狂言或搅局	120
《奥兰多》:性别的化妆舞会	135
女性书写的别样风景:《红辣椒》第二集序	140

女性、镜恋与摄影机	145
游弋书中	151
童心之旅	156
《涉渡之舟》跋	158
面对当代史	
——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163
我所知道的画家	172
跋：欣悦的灵魂	179

戴

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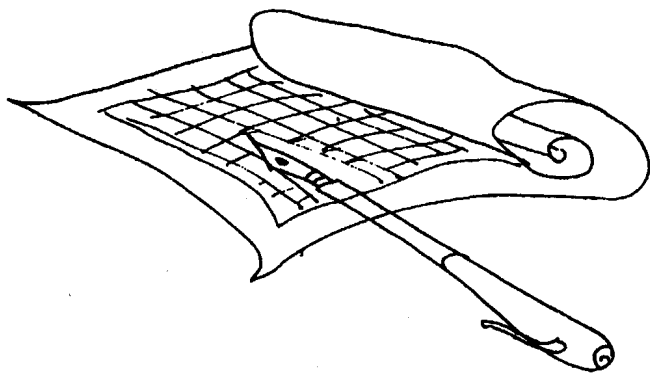
华

随

笔

印

痕



《1984年》与世纪记忆

霍布斯邦在他的历史书写中,将我们亲历并将送别的世纪,称之为“极端的年代”,事实上它也同样可以称之为“革命的年代”与“资本的年代”。也许更为准确的称谓,是一个革命与送别革命的年代,是一个反抗资本而溃败于资本的年代。似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世纪,但在这个世纪末,人们却在盈盈的安祥中体味着无以名状的沮丧。当放置人类绮梦和未来畅想的地平线在一次次伟大的社会实验与失败中沉沦之后,我们甚至无法讲述新的寓言与预言。人们无奈且无聊地将其冠之以“后”。尽管此“后”/Post非彼“后”/after,但这个世纪末确实像是所有伟大预言应验与破产之后的“唾余”。

在中国,而且在世界,20世纪重要事件的亲历与目击者难于分享他们的记忆,那如果不是温馨、狂热的怀旧,就是不遗余力的唾弃与否认。但我想到的是自己的一次与他人记忆的冲撞,是关于一本书:《1984年》。那是所谓的“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的两本是《美丽的新世界》和《动物农庄》。但似乎只

有《1984年》，不仅牵系着本世纪的若干重大事件，它本身亦是诸多重大事件之一。

是在我的大学时代，读到了此前从未听说过的《1984年》，读的是彼时彼地一个特殊版本——那是本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人会记得的、特殊的杂志：《编译参考》，大开本、大字号、素面子。一本特权层的杂志。——对于“文革”，一个不无怨憎与伤痛的点，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特权层从未与外部世界隔绝：江青始终追随着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林立果酷爱美国摇滚。可我们却几乎读不到书。尽管是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或已经筛选的18、19世纪欧洲文学的译著。1978年或1979年？《1984年》分三期连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它流进了大学校园。可能是密闭的权力圈在彼时出现了裂隙，可能是当时贵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多少也拥有一点特权。作为一本确定无疑的“反动寓言”，它在大学生、也许是我置身的那个小世界里，引发了微型地震。那个年头，对知识、书籍的饥渴仍十二万分地被封闭和匮乏所放大。和大多难于获得的新书一样，它在不同的宿舍间流传，每人两小时吗？不记得了，只记得曾被排到午夜两点，当然是无怨无悔地等到那个时刻；第二天吗？只能旷课了（记得通过同样的途径，用同样的方式读过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记得最初阅读时的战栗，那是一种毛骨悚然、撕心裂肺的恐怖认同：第一次，从外面，从一个寓言（预言？）中读到自己成长的年代，读到了曾无限熟悉的一切：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禁欲的、狂热的少女；甚至匮乏的物质供应、劣质香烟以及吸劣质香烟的方式——小心地揉松、磕实、点燃，而后直立起吸，一如吸毒者的动作；甚至是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一点点精美的物品、尤其是对文具的情欲般的渴求和珍爱。只是“他”的名字，是“老大哥”。在深深的震

惊和慑服中，反复地默念着作者的名字：乔治·奥威尔。——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想像？充满敬畏地发现，成书的日期，是1949年。在继续的阅读和焦灼的等待中，读到了主人公的离轨，读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和秘密爱情。一份欣喜，一种自恋式的认同：将自己从1975~1977年间经历的心灵反叛和不轨初恋附着其上。窃以为此前的悲剧是因为人们没有机会获得“真理”——因真理被监禁，谎言遍布于世。

正当其时，彼时一个极为风云的作家来学校演讲，作为一个经二十三年流放的“归来者”，他颇富传奇；作为一个刚刚发表了轰动作品的文人，他极富口才。他讲：越战斗越安全；他讲，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真理，便不可能再被征服。听得热血沸腾。顾不得平素的矜持冷漠，拍痛了手掌。但不久，此君便因一时“风吹草动”，露出了极怯弱的面目，并自食其言。遭到的打击，近乎失恋。也是在这时，终于读到了书的后三分之一：主人公终于和他神秘的“知音”相逢在“没有阴影的地方”。但那不是阳光明媚的“自由乐土”，而是警察机构的大楼：没有洞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灯光永不熄灭。在无尽的肉体和精神凌虐之后，是对爱人的出卖。是对爱的背叛。是不再知道爱为何物。是“忘怀洞”——对记忆的彻底改写。是权力面前无所谓“真实”与“真理”。被彻底改写的主人公，会满怀敬畏地朝向阳光伸出自己的手掌，他会看到自己健全的手上，长着不存在的第六个手指。奥威尔最伟大的天才洞见是，对于权力机器，肉体的消灭不是目的，心灵的征服才是战绩。尽管彼时已不再“全信书”，但那是本什么书啊？！简直是圣音。于是，这样的结局，不亚于五雷轰顶。我仅有的一点乐观被粉碎，仅有的一点希望被遮蔽；为了这本书，原本便陷在阴郁中的我更加颓唐。在无人处，我甚至会恐惧地对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个手指，一

如书中被权力/暴力重塑过的主人公。1984年，成了一个梦魇。难道更恐怖的时代尚未到来？

不久，结交第一个德国朋友（用当时的标准说法：是“外国友人”）苏珊娜。颇吻合于对洋人的想像：我们两个人比肩而立，一样的身高但她婀娜丰满，金发碧眼。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触一个完全异样的人种，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体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我们彻夜倾谈，发现我们可分享的体验竟是如此之多。也许是苏珊娜的学识和胸襟给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觉：对于友善而优雅的欧洲人。但确实，如果说，80年代国门初开，那么是这个德国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一日，谈起了《1984年》，我说起我对小说的预言性的惊叹，并未说得更多——我毕竟认定，她不会懂得。她却几乎激动地站起来：“谁说是预言？他写的是历史。是纳粹！”“纳粹？当然不。他写的是红色恐怖。”“那是在德国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发生了。但是在很久以后，在中国。”

我们好像在争夺这悲剧的原型权。为了证明，她翻出德国的画册。是的，“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还有禁欲、疯狂和物质的匮乏——那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日后看到纳粹著名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发现与我们成长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其表象系统相像到令人发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长大成人；而她是在父亲反复的讲述中铭记了那可怖的岁月。她因此不同于视二战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断层的西方同代人。

对了，一个细节。在我们“争夺”悲剧所有权时，她出示给我一个密码锁，她选定的密码是1984，她说这锁从高中寄宿学校跟她到现在；她祈望每一次开锁，便是一次对魔咒的解除。她同样恐惧着历史的轮回。在二十岁的年龄上，几乎下泪——为一

个来自异文化的知交。1984年，她给我写来一封短信：1984年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对宗教极端轻蔑的她，用了这样的措辞。1985年元旦到来的时候，世界重要报刊的话题之一：我们安度了1984年，预言幸未成真。

我记住了那把锁，它第一次使我尝试走出自己的历史和伤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权、暴力、体制与自由。一直热衷于阅读种种关于大革命与历史浩劫的书籍；因无法逃离记忆中的梦魇，便尝试去正视它。法国大革命，纳粹，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法国五月风暴。是的，《1984年》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预言，也不只是一个关于红色的寓言。“文革”岁月不是“纳粹”时代，严格说来，那是不可类比的两次历史事件。尽管它们拥有若干共同的能指，极权、狂热的群众运动、公开的、惨不忍睹的群众暴力。但它们确乎并不相同：一个是某一种族——据说高大健美、金发碧眼的日尔曼种族清洗“劣等”民族，并称霸世界之梦；一个是对近一个世纪的梦想尝试与实践：结束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建立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体制，最终通向人类大同。一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中，西欧资产阶级右翼的陡然崛起；一是战后全球左翼浪潮的最后一度涌起时，似乎隔绝于世界的中国掀起的第一浪。将“文革”简单地比同于纳粹，是一种莫大的诱惑，也是一处廉价的陷阱。一个似乎极为清晰的事实是，就表象和群众心理学而言，左翼的、或右翼的群众运动似乎极为相近，以致难于分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而不再拥有梦想，不再目击并指认世界的谬误与不公；它不该意味着面对苦难，我们便闭目塞听，相信人类命该如此，别无选择；或更有甚者，相信物竞天择，他人该死。

后来知道，苏珊娜也错了：她和我一样过分沉湎于自己的历史与自己国度中的创伤记忆。如果说有某种引发奥威尔写作

《1984年》的历史动因,那么它得自第三帝国,也得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它是一个关于现代专制的天才寓言。不仅在表象与群众心理学的层面上无法分辨,暴力是体制的基本特征,而非某一特定制度的标识。认定《1984年》为“告别革命”提供了弹药的人们,常常忘记或不曾知道乔治·奥威尔是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的战士(他也正是因这场战争中的伤病而英年早逝);读他的另一部反面乌托邦《动物农庄》,看到造反的动物升起自己的旗帜:牛角和猪蹄,感到无限会心的人们是否体味到弥散在整个作品中的、巨大的伤痛?读到《动物农庄》中的动物,赶走了人的统治者,却仍生活在统治之下;尽管如此,它们仍自豪于自己那惟一的动物农庄时,你是否体味到此间巨大的绝望和忧伤?忙于为梦碎而弹冠相庆的人们,是否认定梦醒之后,我们便到达黄金时代?一个不再有梦的人类是否便永远幸福?庆幸我们逃离了1984年的人们,是否从未读过《美丽的新世界》?人们是否认为较之那“永远明亮”的警察总部,我们宁愿接受一克“索玛”带来的幸福时光?我拒绝这样的选择。两恶相交,不意味着应该择其稍善者。

也许,这一世纪末的悲哀在于全世界人们都感到自己是胜利者同时,将大多数派定为失败者。

1999年2月29日

没有屋顶的房间

1

写作之于我，是一处没有屋顶的房间。它是一种裸露，又是一份庇护；是一次规避，又是某种触摸。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有时怀疑，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是否已丧失了生命的真实。读王安忆的话“我坚持不懈地造下了一座又一座纸做的房子，我自己似乎也成了个纸人儿”，有一种久违了的感动。对我，一个理论评论者，甚至没有纸房子，只有扁平地流淌开去的文字。

没有屋顶，意味着写作者从事着一份瘸腿魔鬼的勾当：揭去屋顶，展露其中的秘密。但没有屋顶，同时意味着为瘸腿魔鬼所戏弄；它将写作者暴露在天幕下，暴露在俯瞰细查的目光中。不喜欢用“精神家园”的字样，因为“家园”是一处确信无疑的归属，一份有家可归的安详。而今日写作，所依凭的、获取的只是一份

真实的渴望，某种不宁的躁动。在我看来，今日写作，不同于昨日写作，在于身为写作者多少清楚：自己心里并没有多少“真理”。不属于快乐欢呼“真理”死亡的人群，也不是欢悦地“告别诸神”的一个；于是，目击者所拥有的，只是一份散漫开去的悲哀。没有屋顶的房间，并非真正的居所，当然无法“诗意地栖居”；它间或遮风，但无法避雨雪。它脆弱而可疑，却别无选择。没有屋顶，并非意指没有庇护或闭锁；它间或是一种拒绝庇护与闭锁的选择与姿态。拥有天空，同时承受风雨；要求发言，则是放弃独处与沉默。拒绝，或说“不”，原本不该是“喧嚣与骚动”，甚至也不是“呼喊与细语”。那是一份固执的沉默，其间或许有勇敢与真理。但写作者拥有的只是语言。

领略过许多“语言”，诸如“书写”了数万年的冰川漂砾上的擦痕，或喷吐着火舌的枪口，明白了文字是其中至为苍白、无力的一种。当它是某种理论或批评的文字时，甚至不会有稀薄、洒染开去的血痕。写作，同时怀疑写作；而怀疑写作，也就是在怀疑自己，怀疑90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人文知识分子，一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一度“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一度成了“将要即位的新神”，一度又寒酸、潦倒，不值一文。但始终，是一处寂寂中的喧嚣，语词奔溢间的失语；是忠诚的叛卖，退守间的角逐；是一份不能自己的饥渴与执著。但面对“后冷战”与“后革命”的时代，丧失了文化空间的方位与坐标，于是充满了激进的保守，喜气洋洋的世纪末，工业化时代的后现代，优雅的媚俗等等，等等。那么何谓知识分子？何谓“有机”的或“学院”的知识分子？何谓社会批判立场？何谓职业伦理？何谓文化资本？何谓文化霸权？甚至，何谓文化？甚至，“身份”：你是谁，你站在何处，因何、为何而书写？尽管，“你一生中至少有一个时刻，必需亮出你真正的身份证来”，但足踏世纪之门，每个写作者的身